



哥伦比亚国际投资展望

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国际可持续投资中心

FDI 热点问题的观点

系列 118 2014 年 3 月 31 日

总编辑: Karl P. Sauvart (Karl.Sauvant@law.columbia.edu)

执行编辑: Shawn Lim (shawnlwk@gmail.com)

FDI 区域集聚引发印度后改革时代的利益权衡

Peter Nunnenkamp, Wan-Hsin Liu and Frank Bickenbach *

印度财政部长 P. Chidambaram 称“FDI 在中国创造了奇迹，在印度也同样可以。”¹然而，中国的范例也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（FDI）自由化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方面的局限性。中国的 FDI 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，先前的研究表明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始于 70 年代末的地区收入和增长不平衡。

通常，FDI 的区域集聚与经济活动以及国内投资的集聚是密切相关的。相反，FDI 的溢出效应——能极大地促进 FDI 对发展的积极作用——有一个空间维度，换言之，它们的影响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弱。

鉴于此，我们利用 1991-2005 年印度商务部和工业部批准的项目数据（未公布）对印度各区域 FDI 的集中度进行了系统评估。由于部分批准项目尚未实现，所以项目的获批量可能少于 FDI 的获批量。除了严格意义上的 FDI 以外，这些数据还包括了技术许可（所谓的技术案例）项目以及海外印度人（NRIs）的投资项目。

我们发现由泰尔（Theil）指数²衡量的项目区域集中度，自 90 年代初开始实施 FDI 自由化之后就持续不断地增加。分解泰尔指数，可以看出集中度增加的几个来源。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在三年内（集聚的粗放边际）没有承接任何项目的地区比例从 1993-1995 年间的 57% 上升至 2002-2004 年间的 74%，尽管项目总数在更近的时间间隔内明显高于之前。同时，项目的数量越来越集中于那些至少有一个项目（集约边际）的地区。此外，项目最多的六个地区（孟买、德里、班加罗尔、金奈、普纳、海德拉巴）的项目平均数和项目较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在扩大。

上述六个地区的项目占比由 31% 上升至 77%。这很可能是因为大都市在某些方面更具吸引力。³2004 年与 2005 年，这些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它们各自地区的平均人均收入高出 27%-136%。识字率也比印度平均水平高出 15 到 20 个百分点。并且这些地区在金融和通信基础设施方面也更加完善。

对比不同类型项目的集中度水平，可以发现，技术许可类项目的集中度最低，而外资持有多数股份的 FDI 项目的集中度最高。然而，这些不同类型的项目有相似之处，即集中度随时间而上升。

集中度水平也随 FDI 的主要母国而有所变化。一方面，来自美国的项目集中度水平明显高于平均水平，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来自东南亚邻国的项目也是如此。另一方面，来自欧盟成员国的项目集中度水平相对偏低，尤其是海外印度人承接的项目。美国和欧盟的差异或许是由于美国企业更注重投资服务业（特别是 IT）而欧盟企业更愿意从事制造业造成的。⁴海外印度人项目的集中度水平非常低，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较为熟悉相对偏远地区的情况。然而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即所有主要母国的 FDI 集中度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增长。

在政策影响方面，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基于不同类型和来源的 FDI 集中度的差异得出结论：认为印度早先的政策，如不批准外商独资子公司以及 90 年代初期改革之前的选择性程序审批，是非常合理的，并且有助于 FDI 的福利扩散，而不仅仅局限于几个经济中心。然而，该结论还为时尚早。对于不同类型的项目，外国投资者在转让最新技术方面可能会有所犹豫，除非他们拥有过半股权。这涉及到更高的整体发展潜力和更广泛的 FDI 技术外溢的扩散之间的权衡，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应当考虑到这一点。至于 FDI 的来源，何种程度的行业集聚差异会造成 FDI 集中度的实际变化仍是不明确的。当涉及到区位选择时，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以评估外国投资者在印度经营经验的重要性。对印度的政策制定者来讲，允许所有类型和来源的 FDI，并且使用非歧视的区域政策来促进偏远地区的投资是最好的方式。

（南开大学国经所侯亚美翻译）

* Peter Nunnenkamp (peter.nunnenkamp@ifw-kiel.de), Wan-Hsin Liu (wan-hsin.liu@ifw-kiel.de) 和 Frank Bickenbach (frank.bickenbach@ifw-kiel.de) 是德国 Kiel 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与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。本篇展望基于 Frank Bickenbach, Wan-Hsin Liu 和 Peter Nunnenkamp, 《印度后改革时代的 FDI 区域集中现象：地区层面分析》（Kiel: 世界经济研究所，2013），同时作者所参考文献中的部分观点在本文中也有所体现。作者对 Padma Mallampally, Premila Nazareth 和 Indira Rajaraman 的同行评议表示感谢。**本文中作者观点并不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或其合作伙伴与支持者观点。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直接投资展望(ISSN 2158-3579) 是同行评议刊物。**

¹ 《印度快报》，2005 年 11 月 11 日。

² 泰尔指数用来衡量不平衡或集中程度，是经济学中常用的统计值，也是广义熵指数的一种特例。

³ 最近研究发现，在地区层面，大城市与 FDI 量存在正相关性。参见 Rajesh Chakrabarti et al.，“基础设施与 FDI：印度地区层面数据的论证分析，” 详见：http://papers.ssrn.com/sol3/papers.cfm?abstract_id=1712185。

⁴ 这一点是由作者对项目的行业分类得出的。

转载请注明：“Peter Nunnenkamp, Wan-Hsin Liu and Frank Bickenbach, ‘FDI 区域集聚引发印度后改革时代的利益权衡，’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, No. 118, 2014 年 3 月 31 日。” 转载须经维尔哥伦比亚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授权. 转载副本须发送到维尔哥伦比亚中心的 vcc@law.columbia.edu。

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：维尔哥伦比亚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，Shawn Lim, shawnlw@gmail.com 或者 shawn.lim@law.columbia.edu。

哥伦比亚维尔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（VCC），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，也是致力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、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。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，VCC 通过跨学科研究、项目咨询、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、教育项目、资源和工具开发，承担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、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。如需更多信息，请访问：www.vcc.columbia.edu。

最新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文章

- No. 117, Rudolf Adlung, “Multilateral investment disciplines: Don’t forget the GATS!” March 17, 2014.
- No. 116, Gary Hufbauer and Sherry Stephenson, “The case for 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investment,” March 3, 2014.
- No. 115, Joachim Karl, “The ‘spaghetti bowl’ of IIAs: The end of history?” February 17, 2014.
- No. 114, Louis T. Wells, “Government-held equity in foreign investment projects: Good for host countries?” February 3, 2014.
- No. 113, Anthea Roberts, “Recalibrating interpretive authority,” January 20, 2014.

所有之前的《FDI 展望》可通过以下网站获得：<http://www.vcc.columbia.edu/content/fdi-perspectives>。